

第 1 讲

经济史中的“奇迹”观念

人文现象的同一性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要感谢法兰西学院的全体教授大会。由于你们的盛情邀请，我荣幸地来到贵院讲授发展的道德体系学比较研究课程。而这个课程的计划是法兰西学院多位院士曾经倡导过的。

这些院士们分属各个不同的学科，正如比较人类道德体系学涉及的学科也分属许多门类一样。这就是说，我们要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和精神气质进行比较研究。

由于道德体系学家横跨几个学科，弄不好就什么研究都搞一点，又什么都不专。而科学的严谨性却要求我们，不是计量经济学家就不要谈论经济，不是日本通就不要谈日本，不是宗教史专家就不要讲新教。这就是说，这种研究工作需要十分谨慎，需要向专家请教，需要经常注意，既要大胆假设，也要关注其他学者积累的活的知识。

然而，科学的严谨性同样有权提出人类现象的同一性问题。难道不该检查一下在各个不同的人文学科中还有没有得商榷的地方吗？难道不该学学中国人在含义为钻研的一句格言中表现出来的明智吗？这句中国格言本身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牛角，另一个是钻子。钻牛角尖，就意味着用一把钻子把牛角挖净。挖得越深，牛角的洞就越窄，挖出的东西也就越少；而且，人们离光明——离其他饱学之士就更远。我们可不要上牛角的当……

要接受文化解释的检验

道德体系学也要接受其他学科的检验。安德列·西尔弗雷德是我的老师之一，他也曾在这个教室里讲过课。46年前，当我准备提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时，他曾告戒我：“你踏上了地雷阵。你要研究精神气质，而精神气质本身就使这种研究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

我们应该承认，尽管他本人通过发表《各民族的魂灵》一书，也曾试图探索一下民族心理学问题。但民族心理学的名声不太好，因为有人故意把这门学问看做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这个问题似乎犯了大忌。例如，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有人便把这句话演绎为在事实面前人人都是一样的。他们不愿意承认存在一种能力的差异，即使仅仅是文化上的差异。

由于我们固步自封，由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的精神沉淀，我们从同代人和我们的前辈以及群体中接受的影响，我们落后了，或者说我们失败了。承认这一点似乎会使人感到无地自容。

对于一个欠发达国家，可以用指责耕地质量不好，或指责销

售体制、殖民帝国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安慰自己。然而，最发达的国家竟然也相信了这一点，或假装相信了这一点。当然，不可否认，气候条件、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也确实起了各自的作用，它们不是加剧了能力的差异、加深了生活水平的差距和维护了弱肉强食的统治吗？

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不要在深受社会环境之苦的人们面前提到社会环境的深重影响。发展得快也好，慢也好，用地理原因来解释似乎比用精神气质来解释更稳妥。

然而，下面，我们却想冒冒险。

应该解释的是：什么叫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似乎是，由于交通运输加快和信息交流瞬间完成，人们已经意识到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出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鸿沟。

而 21 世纪里最引人注目的则可能是，由于欠发达国家的人口爆炸和发达国家中人口出生率的日益下降，这种发展不平衡现象将愈加严重。

我所走过的道路使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受到一定局限，也使我有了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我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迫使我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我的信念来自实地观察多于来自读书笔记，来自同最发达社会和最落后社会中的行为交谈多于同民选议员、负责人的谈话，而且更多地来源于与一些发明家、企业家的会晤。无论是马克思 还是韦伯、凯恩斯 甚至布罗代尔，他们都不在乎这些关键人物是怎样考虑的。幸而熊彼特、哈耶克在乎多一点。

这个研究项目把“发展”和“不发达”的现实与观念结合起来。研究的内容包括几代人提出的疑问，如“光辉的30年”；第三世界的崛起、非殖民化的希望与失望。人们对“不发达现象”的抵制表明，从财政投资、信贷、劳动力、国家或政党的唯意志论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或采取行动）存在一定局限性。必须深入到社会运行机制和精神运行机制的核心中去。

作为欧洲议会海外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我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走遍了整个非洲。后来又有多次机会走遍远东、拉丁美洲、大洋洲。我发现，所谓“欠发达”，首先是传统社会的持续“不发达现象”。而且，几百年来，这种不发达确实同西方医学促成的人口增长交织在一起。但这种不发达首先应该归咎于不利的文化因素；而我们所说的“发展”则是一种勃兴，这种勃兴主要来自多种有利文化因素的融合。应该解释的不是“不发达”，而是“发展”。

有关不发达的种种委婉说法

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欠发达国家”这种提法使人感到刺耳，这种提法含有贬义。谈论“欠发达国家”就像谈论“落后的居民”和“迟钝的儿童”一样，是对人的冒犯。此外，这种提法还使人联想到一种单一模式的某个发展阶段，好像就是比平均水准“多一点”或“少一点”；“高一点”或“低一点”的问题。然而，这涉及到，或将涉及到一个决裂多于连续性的问题。在正式场合，人们宁愿用“发展中国家”来代替这个提法。可惜，这种美好的向往并不符合现实。许多欠发达国家不仅没有能够迎头赶上来，反而被拉大了差距。

或者，用“南方”来比照“北方”。这种委婉的说法并不比上面的提法更贴切。

哪个“南方”？是指南半球？“南方”的南部也有几个繁荣的国家，如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以及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是指北半球的南部？人类的发祥地就在北半球的南部，即非洲的南部。那里有埃及、苏美尔、腓尼基、巴勒斯坦、克里特、希腊、西西里、意大利、波斯、印度、中国。那里的文明在很长时期内比北方的文明更加光辉灿烂。而欧洲，尤其是北欧，当时还停留在游牧族和蛮族阶段。就拿今天说吧，哪个国家的经济能比赤道上的新加坡更繁荣呢？

哪个“北方”？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兰、西伯利亚的爱斯基摩人和因纽特人保留了不发达的所有特征，再往北就没有居民了。至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半球和北半球的两个温带地区，既有发达社会，也有后进社会。

这种用词上的犹犹豫豫本身也表明观念上的不适应。我们应该指出，使用最多的词汇并不一定是纯真无邪的。

“北方”和“南方”说明进步或停滞取决于所处的纬度，也就是说，取决于气候。要证明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只要想一想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位于东京、洛杉矶和佛罗里达的北边就足够了。为什么从人类起源时期开始，南方就能够孵化出直到 17 世纪以前一直是最繁荣的社会，而这些社会从这个时期开始又突然失去了繁荣景象呢？我们看不出来，在哪个星球上，仅仅由于气候寒冷或气候温和便带来了进步，而气候炎热就注定使社会停滞不前。

“第三世界”产生于其他两个世界，即资本主义的“第一世

界”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相互对立的时期。而第三世界试图在时而依靠第一世界，时而依靠第二世界，时而利用这两个世界的矛盾中求得发展。如今，由于“第二世界”已经分裂为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第三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于是，一度被误称为“北方—南方”的客观条件有利的国家与客观条件不利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也被“东方—西方”的冲突取而代之了。“第三世界”变成了“第二世界”人口超过第一世界人口的5倍。

皮埃尔·穆萨提出的“无产者民族”过于参照马克思主义语汇了^[1]，如果人们不愿甘冒被拖进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巢臼的话，就很难接受这个概念。

因此，我们还是撇开这些带有隐语或引申意义的概念，而是采用一些纯粹描述性的、没有理论阐述性的原始提法吧，例如：“富国”与“穷国”、“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发展”与“不发达”等概念。

这些国家是指哪些国家？

撇开这些听起来顺耳但是骗人的委婉用语不谈，由于不发达社会与发达社会同时并存，确实向全人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之一，需要我们应战。而且，如何解释什么是发展，什么是不发达，我们也始终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如何按照发展水平把不同国家排个队呢？

“发达的”国家是指西欧和北欧国家；白人统治的英联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几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地区）以及如今的

中国沿海地区。也就是说，约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 $1/6 \sim 1/7$ 。

“不发达的”国家，包括整个非洲和亚洲，但上面提到的几个国家（地区）以及几个中东石油生产国（它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是靠原油储藏堆成的金山富得流油）应该除外。它们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 $3/4$ 。

在这两个集团之间，还有一个介乎中间的群体，包括东欧和南欧、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它们的景况处于中等水平，占全球人口的 $1/13$ 。

富人有 8 亿 穷人有 40 亿，中等水平的人有 4 亿。可以把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分成这三组：第一组的人均收入高于 12000 美元；第二组的人均收入低于 3000 美元；第三组的人均收入处于这两个数字之间^[2]。

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大致估算。一些人的“贫困”同另一些的“富裕”相比较，有的是夸大了，有的恰好相反，掩盖了真相。出于下面六个原因，应该对这些数字区别对待。

1. 穷国 基本上是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它们靠的是家庭自我消费或与邻国以货易货。当这些国家开始步入发展阶段时，地下经济、黑市劳动和平行流通体系把官方统计数字搞得混乱不堪。

2. 不同国家有不同需要。锡兰 斯里兰卡 的取暖、住房和穿衣费用就比加拿大更便宜。生活水准的组成因素几乎无法具体计算，大自然可以慷慨地把这些生活物资提供给某些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要靠昂贵的价格购买。

3. 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是以官方汇率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而贫穷国家的货币同其实际购买力相比，一般被大大低估了。比如 在法国，一本书 布封面的值 150 法郎 精装的值 200 法郎；

而在中国，同样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美国式布面装帧，价格仅相当于 10 法郎。这个价格里面还不包括翻译费用。两件套西服套装，在中国卖 150 法郎；而在法国，恐怕要卖 2000 法郎，诸如此类，等等。如果官方数字绝对可靠的话，人们常问，中国人怎么能靠 1000 美元维持一年的生活，也就是说，人类的一半被认为是这样生活的呢？

4. 贫穷国家的家庭情况普查也令人怀疑 为了应付超生 统计往往有问题，因为超生要受到严厉处罚。例如，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婴儿出生时便没有登记。

5. 除了这些个人为糊弄当局而弄虚作假外 当局也弄虚作假来糊弄国际组织。因为世界银行、国际开发总署（ID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向最贫穷国家提供特别优惠的贷款，尤其是提供几乎无息贷款。因此，人们尽力缩小申报的家庭收入数字。

6. 在拥有寡头社会结构的国家中，人均收入往往是骗人的。在那里，少数人的巨富掩盖了多数人的贫困。

为了保持科学性，我们提出了上述种种保留，但这些保留意见并不排除这个基本事实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条鸿沟。

不发达的量化指标

有几个不容置疑的数字显示出这种悲惨事实中的差距。这些数字可以补充或矫正有关人均收入的统计数字。况且，人均收入只是衡量发展与不发展的各种标准之一，绝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

1. 婴儿死亡率。在 1000 名存活的新生婴儿中，出生第一年内死亡的婴儿在非洲为 103 个，在亚洲为 81 个，在拉丁美洲为 54 个，在欧洲为 13 个，在北美洲则只有 10 个^[3]。

2. 营养不足。穷国中有一半人口每人每天得不到维持生命所必需的 2500 卡路里热量。这种营养不足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即缺乏蛋白质、矿物盐和维他命，从而影响了儿童的神经元的生长，以至损害了他们一生的思维能力。

3. 文盲状态。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非洲有 1/2 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在拉丁美洲和东亚，受到初级教育的人数尚可，但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则很欠缺。

4. 性别歧视。在“南方”国家，女孩子上学的人数比男孩子平均少两倍，在印度和穆斯林国家中情况更为严重。

可以看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家从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得知，20 年来世界人口增长了 15 亿，收入增长了 37 万亿美元。但是，人口增长的是穷国，美元增加的是富国。

这些不发达指数可以说明什么是不发达。但它们不能解释不发达的病因，也不能提供医治不发达的良方妙药。

反对不发达的斗争连连受挫

人们曾经试图把富国的良方妙药搬到穷国，但这些尝试大都以失败告终。由于思想深处的抵制，使生产技术和转移方式的转移失效，甚至恰得其反。有人以为，只要简单地把有形的机制或表面的程序照搬过来就可以搞好一种经济。半个世纪以来的屡屡失败告诉我们，这种主张是白日做梦。

事实证明，不仅不能用法令改变社会，也不能靠强加一个

“贴着‘舶来品’标签的模式使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西方模式的两种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模式曾经试图扩展到全人类。一方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殖民化，另一方是带有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集体化，它们分割了不发达世界。这两种形式的任何一方不仅未能普及到全世界，反而都半途而废了。

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无论在其先驱者的设想中或在他们的同化实验中是多么美好，造成的结果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统治。资本主义殖民化并未能扫除发展的障碍。更有甚者，这种殖民化往往加剧了贸易的不平等，而贸易是殖民地赖以生存的基础。资本主义的殖民化招致一场暴力的拒绝。这种对殖民列强的拒绝，甚至包括对美国的拒绝——尽管它曾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在中国、越南和伊朗的表现形式就是资本主义殖民化被妖魔化了。

一度被移植到异类民族和中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苏维埃制度也招致一个不满运动，不仅导致苏维埃帝国垮台，而且导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崩溃。

甚至在出现这种结局之前，带有马克思主义意味的第三世界主义，不管其愿望多么仁慈，则就早已失败在先了。

于是，出现了寻求反对不发达现象斗争的第三种形式：合作，或更具体地说是提供援助，提供建议、鉴定和指导。同前两种形式相比，这种形式引起的消极后果较小。因此，这种方式没有遇到覆灭的命运，但也带来了不少失望。例如，专制主义大行其道，内战或种族战争频仍，内部互相残杀死灰复燃，利用等级门第攫取权力与财富，巨贪，以及由于精英们特别是医生的出走，后来村民自己也离开了，造成农村的荒漠化。这些农民拥挤在贫民窟里，陷于贫困、暴力、吸毒和犯罪的泥潭。

这三种反对不发达现象的斗争形式已经表明或正在表明，这

些斗争都带有局限性和不适应性。那么，应该放弃这些斗争吗？能够放弃这些斗争吗？从人文的角度讲，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起飞

但是，发展从哪里着手呢？从形式上模仿一种理性经济的规则失败了。那么，通过把一种活跃精神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一种文化中去，对个人进行教育和提高集体的文化素质则可以取得成功。然而，这是什么精神呢？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一个更加不可逾越的障碍，现在看来，确实也未能逾越。这个障碍就是发达社会确实也不了解他们自己的秘密。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有多少种理论就有多少理论家。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未能把它的真理强加给别人。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夫把 1783 年命名为英国工业社会的“起飞年”（take off），也就是发展的元年，是工业革命、扩张和增长的高潮。最新经济史倾向于把英国工业起飞的前兆追溯得更遥远。然而，史学家也好，经济学家也罢，尽管有了三个或四个世纪这方面的经验，但都未能确定什么是经济起飞的决定性原因。我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了解很差，又如何到别的国家去指手画脚呢？

目前，人口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动荡与如何管理世界新秩序交织在一起，这样的局势实在令人担忧。自 1945 年以来，恐怖的平衡曾经使我们的地球一度保持稳定，现在已经让位给由游戏规则来平衡。“东方与西方”即“代议制民主国家”与“人民共和国家”之间的正面冲突已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南方与北方”的大规模冲突。也就是说，穷国人民与富国人民之间

经济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动乱，原教旨主义的愤怒，种族之间的自相残杀和各种人类灾难，使“发展中国家”的局势日趋恶化。而且应该承认，这些所谓“发展中国家”，往往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了。

对这些国家来讲，发展不是奇迹，而是空中楼阁，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这怎能不使人联想到，当年瘟疫流行和百年战争几乎把法国置于死地时，法国是处于何等沮丧的局面呀。

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受其自身社会矛盾的质疑，已经不能充当普遍适用的模式。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历史吧。让我们看一看“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任何一个严肃的医生都不会忽略病人的既往病史。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发展的来龙去脉，而不要急着去推断发展的性质。

既然经验一再无情地告诉我们，发展不能人为地复制，就应该追根穷源，弄清经济起飞时期的奥秘，我们过去忽略了这一点。

幼稚唯物主义所忽略的东西

为什么英国出现了这种早熟的工业化呢？历史教科书或地理教科书回答说：“因为它有煤炭。”为什么法国就没有那么辉煌呢？“因为法国的煤炭都是贫矿。”那么，为什么日本实现工业化特别快呢？其他教科书，或同样这些教科书又反过来解释：“日本人不得不出口工业制成品，因为他们要花钱进口本国所缺少的煤炭……”

这种信手拈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怎么站得住脚呢？

经济增长的外部迹象都有哪些呢？这些外部迹象包括某些可

以自我维持的重大经济指数的增长，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出口；生产条件的累进变化，如投资的增长、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系列的技术革新、新的消费习惯、企业家的预期变化；结构性变化，如道路交通的发展、都市化程度、农民比重的下降、职工数量的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工薪阶层收入的增加。所有这些增长现象都预示着发展。

弗朗索瓦·贝鲁曾经给发展下过如下的定义：“将一个国家居民的各种精神和社会变化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能够日积月累地持续地增加其总的实际收入。”我们能不能再引申一下呢？精神的变化难道不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主要因素吗？而且不是比发展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吗？

18年前，我们就在《法国病》一书中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应不应该把一个社会的最主要的非物质特征，例如宗教、偏见、迷信、禁忌、动摇、对权威的态度、历史的反思、个人和群体的伦理、教育及教育所传播的价值观等等排除在外呢？这些非物质特征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行为和整个文明的发展进程，甚至影响到最主要的物质领域，如投资、生产与贸易、经济增长率等。经济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些原始数据，如原料、资本、劳动力；或简单地等同于生产关系。但经济为什么不能首先是一种有利于经济的精神气质呢？既然民主不只是限于一种体制，为什么不能要求有一种能够使这些体制发挥作用的公共精神呢？那么，这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导致经济进步或经济落后、政治危机或政治平衡的一个原因呢？文化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文化因素是决定性的原因。

前因与后果交织在一起，不可能轻而易举地理清头绪。历史不是单线发展的，历史是多方位的，因此，历史研究也应该是多

学科的。如果孤立地拿出一个因素硬说它可以解释一切，那是妄想。然而，在众多的变化因素中，强调一下幼稚的唯物主义所忽略的一个因素 即人类行为因素的重要性 是不无裨益的。毕竟，人类行为的因素最为重要，而且最取决于我们自身，这样思考问题是否太过分了呢^{[4]9} 但我们就是要本着这种精神进行下面的考察。

对不发达的综合分析

根据什么来辨认一种不发达经济呢？我们不想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宁愿做一些描述性的说明。

通过三点，只能连一个循环。不发达的恶性循环也不例外。我们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冒昧地归纳出 12 条，这 12 条适合不发达社会，但仅仅是发达社会而已。在不发达社会中，我们会不时发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 12 种因素，它们互相连成一个恶性怪圈。

不发达社会囊括了以下各种特点。

1. 这是一种停滞的社会。这种社会拘泥于自我复制。社会成员的地位固定在被强加给他的终生不变的职务上。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即使不被禁止，也遭人白眼。

2. 这是一种敌视创新的社会。技术创新或知识创新沦为一种有趣的猎奇。新生事物往往被看做一团糟。各种法规、法律、习惯和行为都是通过充满偶像崇拜的传统来传递的。墨守成规的集体行为得到好评；打破常规的做法被认为是歪门邪道。

3. 这是一种被划分为三六九等的社会。在那里，思想交流和人员交流似乎在密封的罐子里进行的。社会成员不能享有共同的

教育体系和信息体系，从而达到同一性。这种社会的等级差别成为建立一种真正交换性经济的障碍。

4. 这是一种不宽容的社会。社会对其成员实行严格的审查。知识自主被看做是一种可能导致涣散的威胁。

5. 这是一种昏庸的社会。领导阶级不想让底层人民受到教育，担心他们会收回领导阶级对知识的垄断。书籍和报刊的传播仅限于特权阶层内部。

6. 这是一种被监管的社会。社会被政治权贵和宗教头目遥控，他们监控了所有社会活动。等级森严。这种社会自认为比个人还清楚什么对自己更合适。一个特权阶层控制着权力，人民没有行使任何主权的手段。

7. 这是一种经济被束缚的社会。生产规模和生产形式、交换、投资，都按习惯来确定。在组织活动和劳动分工上，只依赖有监控权的机关，不相信竞争和预测的活力。财务收入报表是编造出来的。

8. 这是一种经济被统制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掌握在拥有（内部或外部）政治权力的人的手里。当地居民没有能力自己开发他们的资源，只能或者让这些资源睡大觉，或者请外人来开发这些资源。

9. 这是一种脆弱的社会。卫生极差、疾病蔓延和死亡率高被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人们听天由命 瘟疫、地方病 甚至流行病，谁碰上谁倒霉。

10. 这是一种超生的社会。婴幼儿死亡率很高，但人口由于可以随便受孕而得到弥补。生命不能得到预防保障，也不是有计划地传宗接代，而是靠身不由己的自然繁衍。靠西方医学，特别是靠抗菌素，降低了死亡率，但在一代或几代人之内，超生现象继

续存在。因而，经济增长率未能超过人口增长率。

女孩子注定要早婚、操持家务和不断生儿育女。妇女受孕率为 1:1，甚至达到 1:5 以上，以至经济增长率根本无力承担这样一种人口扩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愚昧，而且，她们往往拒绝各种避孕方法。多子多孙的传统观念非常顽固。而在同一个时期 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妇女只生育 1.7 个或 1.4 个婴儿（如德国西部各州）

11. 这是一种匮乏的社会。本地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难逃饥荒，甚至断炊的命运。居民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居民处境脆弱，易受国际经济景气变化的打击。从西方引进的医学进步促进了人口爆炸，更加剧了食品短缺现象。

12. 这是一种痉挛的社会。既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怀疑，政府无力保障社会的安全，也无力打破个人的、派别的或部落之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社会不安定阻碍了甚至扼杀了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由于拒绝声名狼藉的不平等贸易（贸易也确实变得不平等了），使这个社会不得不闭关自守，对外封闭或采取排外态度，这又促使这个社会更加脆弱。由于缺乏负责任的自由对话，这个社会只好从种族冲突中寻找摆脱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动乱的办法，把内部动乱迁怒于外国。

发展的组合分解

与此相反，发展把下列各种特征综合连接在一起。

1. 社会流动性，市民社会的发展，体制的适应性。
2. 接受并追求创新 预测 前瞻性 鼓励研究与开发 发明，创新，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因素，而不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3. 社会的同一性，通过自由的物流、人流和信息流才能实现这种同一性。

4. 宽容，基于对多元化的爱好，对另类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

5. 教育，全力依靠教育，信赖智力的发展与文化的传播。

6. 政治组织，探索一个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承认其合法性的政治组织。

7. 经济领域中运行的独立自主。

8. 一种建立在最大多数人合作基础上的经济。

9. 公共健康被看做是一种基本价值。那里的死亡率已经被强有力地控制住了（直至采取激烈的治疗方法）。

10. 有节制的和负责任的出生率（可能冒一个严重风险，就是拒绝生育）。

11. 对食品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通过一个公开的竞争性的市场，经常对这种配置进行谈判。

12. 通过一个合法的警察权力和司法权力，实行一种有节制的暴力。

非物质的第三因素

如果人们接受这两种组合分解，即不发达社会与发达社会的组合分解，也就等于同时承认，要理智地了解发展问题，就必须来一次真正的哥白尼式革命。资本与劳动，按照传统分析，即自由派思想家和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分析，构成了经济的两个主导要素。今后这两个要素将降低为次要的因素——它们只是卫星，而不是万有引力的中心。

我们应该发挥精神力量的关键作用，因为，面对我在上面提